

大将许光达缘何自请“降衔”



许光达在连队慰问

功不可没 战场显神威

许光达 1925 年入党，1926 年入黄埔军校第 5 期攻习炮兵专业。1929 年到 1932 年，许光达跟随贺龙开辟洪湖革命根据地，他任工农红军第 6 军参谋长，第 17 师师长、政委。许光达曾指挥 17 师官兵与国民党军数次激战，掩护了第二军团指挥部安全转移。

1932 年，许光达负重伤，赴苏联治疗。在苏联 5 年间，他曾先后入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者大学学习，打下了深厚的政治理论和军事学术功底。他是 10 位开国大将中两位留学生之一。解放战争中，许光达先后任晋绥野战军第 3 纵队司令员，西北野战军（一野）第三军军长、第二兵团司令员，立下汗马功劳。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他受命组建军委装甲兵，任装甲兵司令员，被称为中国的“装甲兵之父”。

几番让衔 英名天下扬

许光达的老首长贺龙这样评价他：“光达同志有大革命的经验，有内战的经验，有抗日战争的经验，有解放战争的经验，还有苏联红军的经验，我觉得应授予大将。”

1955 年 9 月，许光达得知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大将军衔的消息时，对家人说：“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多年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以及更多叫不出姓名的战友都牺牲了！我的这顶‘乌纱帽’就是建立在他们流血牺牲基础之上的，我这个幸存者今天已经得到很高的荣誉了，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啊！”

他曾经几次找长期领导过他的贺龙等老首长“走后门”，提出降衔申请，但均未获得同意。无奈之下，他几经思考，提笔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各位副主席写了一份情真意切的“降衔申请书”：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大将军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槌似地不停地敲击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带四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绩授衔。回顾自身历史，1925 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 年—1937 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时期……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
1955 年 9 月 10 日

在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高扬起许光达的这份“降衔申请书”，对军委领导说：“这是一面明镜，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毛主席说：“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徐达是何许人也？他是真正的明朝第一名将、杰出的军事家。他用兵如神，为人公正。在辅佐朱元璋战群雄、打天下、夺江山的斗争中，他立下了头功。毛主席拿许光达与徐达相比，古有徐达，今有许光达，这当然不是说他在 10 位开国大将中战功数一数二，但至少也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肯定了他的赫赫战功，二是表彰了他的高风亮节。

中央没有同意许光达的降衔申请，仍然授予他大将军衔。他鉴于党的决定，接受了这个衔级。后来，他又经过再三申请，总算是给自己降低了一级薪金待遇。

正义凛然 清白留人间

“四人帮”呼风唤雨的时候，

一些“造反派”先后两次把许光达抓走，“审讯”100 多次。有一次，许光达被连续批斗了 53 个小时，“造反派”们轮流吃饭、睡觉，却不让年过花甲的许光达休息片刻。为迫使许光达就范，他们还特意从摩托队找来一个一米八以上的打手，专司拳打脚踢、坐“喷气式”之职。

许光达在被关押、受折磨期间，一直胸怀坦荡、镇静自如。有一次“造反派”审讯他时，他以愤怒和嘲弄的口吻，义正词严地说：“你们说的所谓‘二月兵变’，根本就没有那回事！谁都知道，搞政变是要掉脑袋的。我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装甲兵司令员，如搞所谓的‘二月兵变’，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才弄个‘参谋长’当当，这种赔本的买卖，我会干吗？”直说得那些狐假虎威的人无言以对。

在他第二次被抓走时，他就有了付出生命代价的准备，他对夫人邹清华说：“他们哪里是要我去做什么检讨，他们是想要我的命！”走后，他委托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公务员，带给家里一张纸条，上面抄录了一首七绝：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是明朝景帝时兵部尚书于谦写的一首题为《石灰吟》的言志诗。他在抄录这首诗的后面，还特意加注了一句话：“我觉得这首诗很好，特抄。”

1969 年 6 月 3 日，在贺龙被迫害致死前 6 天，许光达含冤逝世先他而去。

1977 年 6 月 3 日，在许光达含冤逝世 8 周年的日子，中央军委发出 6 号文件，为许光达平冤昭雪。6 月 21 日，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

著名学者季羨林，曾为许光达故居题写了 12 个大字：光被四表，誉达三江，清白传家。

（摘自《人民网》）

孙科离美返台前后

孙科是孙中山先生的独子，1891 年出生，早年赴美留学。1945 年任国民政府副主席、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他曾于 1931 年和 1948 年两度出任行政院长，前次一月不足，后次只做了 68 天。国民党败退后，孙科没有直接去台湾，而是去了美国，寄居在子女家中。1965 年他到台湾，任“考试院”院长。至于他为什么去台湾、怎么去的台湾、去台湾前后发生了什么故事，知道内幕的人却不多。

与李宗仁结怨去了美国

1948 年秋冬，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淮海战役打响，国民党军队连遭败绩。

这年 5 月出任行政院院长的翁文灏，面对日益恶化的国民党统治危机一筹莫展。11 月，上任不到半年的他，再也支撑不下去，黯然辞职。

1948 年 12 月 23 日，孙科怀着“壮士断腕”的心态，二度出任行政院长。后来孙科因竞选副总统受挫，与李宗仁结怨。不久他向李宗仁提出了辞呈。而此时，国民党已是兵败如山倒。

世界如此之大，究竟何处为立

锥之地，台湾抑或海外？正好他的好友傅秉常在法国乡下买了一栋房子，有多余的空房三四间，愿供孙科夫妇栖身。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先去法国客居一段，然后向当地申请了赴美护照。

孙科夫妇初抵美国，先后寄居在两女家中，1954 年夏迁往加州，蛰居洛杉矶郊区次子治强寓所。孙科夫妇出国远行的盘缠还是靠卖房子凑的，他们闲居美国，没有任何固定收入，全仗子女接济，省吃俭用，一切自己动手，度过了十几个落魄清苦之年。

接任“考试院”院长

1962 年的“双十节”前夕，在台的广东中山籍“立法委员”刘崇龄提出质询，说：“最近孙先生于言辞之间，也怀念台湾的故旧，同时常表露出有思乡之感。”他希望能主动邀请孙科回台湾看看。之后，孙科与台湾之间联系频繁，不断商讨回台有关事宜，台湾当局表示欢迎。双方就这样你来我往，达成了某种默契。孙科终于在脱离了国民党多年之后，跑回台湾“归队”去了。

孙科返台，名义上是参加“国

父百年诞辰”纪念，但这不过是个借口，实际上他已准备长期落户台湾。

1966 年 11 月 12 日这一天，是孙科返台一系列活动的高潮。上午，他参加了各界举行的“庆祝国父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下午 4 时，“国立中山博物院”大厦举行落成典礼，孙科主持“国父”铜像揭幕幕后致辞。12 月 16 日中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在台代表等聚餐，欢迎同为代表的孙科，老友重逢，颇为动情。

后来在蒋介石提名下，孙科接任了“考试院”院长一职。孙科晚年，可谓精神领导“考试院”达 7 年之久。他只把握政策，至于具体工作，则放手由下属去做。“考试院”在他的领导下，的确做了不少事，行政部门和人事单位主官对他非常尊重，“两院”协调密切，凡事也就迎刃而解。

1973 年 9 月 13 日下午 5 时，孙科突发心脏病，在

台北荣民总医院结束了一生，终年 83 岁。

（摘自《文史春秋》）



孙科和孙中山



1964 年 巴金的大寨之行

大寨，这个位于太行山一隅的农村，历史的风起云涌曾经把它捧居全国农业战线上一颗光彩夺目的亮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声名鹊起。是也罢非也罢，但它当年独具的魅力确实吸引了不少中外名人来探访，巴金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是第一个来到大寨采访的外地作家，也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大寨行。

1964 年夏天，正值大寨层层梯田披满浓绿、玉米吐穗灌浆时节，远居上海大城市的著名作家巴金一路风尘仆仆慕名来到大寨参观访问。此时的大寨，在取得抗灾胜利后，正在进行紧张的恢复工作。人心奋发的情势，旧貌换新颜的热火朝天景象，吸引着参观者从祖国四面八方涌来。

巴金在大寨、昔阳住了几天，见到了许多大寨人，还踏着泥泞的山路不知疲倦地参观了狼窝掌、合作沟。在访问大寨两天的时间里，巴金兴致勃勃地先后见到并访问了贾承让、梁便良、贾进才、贾来恒、宋立英、陈明珠、李喜庆、赵素恒、贾秀兰、李虎妮等十余位共三代的大寨创业人和后来者。他四处奔走，详细采访，真实地感受到了大寨人那质朴、热情、率真、敢想敢干、不畏困难的可贵精神，他被大寨人的创业精神所深深感动，也深为钦佩。

回到上海后，巴金激情澎湃，文思泉涌，奋笔疾书，很快洋洋洒洒一气呵成了长达 26000 余字的纪实散文名篇——《大寨行》，后由山西人民出版社于 1965 年 8 月出版发行。

巴金在《大寨行》里以充沛的热情和流畅的语言细致入微地描绘了他在大寨几日里的所见所闻及所感所思，大寨村欢欣和沸腾的景象力透纸背。

这次大寨行，巴金至少 4 次接近、拜访过大寨村中的那棵极具象征意义的大柳树，对这棵饱经沧桑的历史见证物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很深的感情。巴金的作品向来都是感情真挚而热情奔放的。在《大寨行》这篇散文中，提及大寨村中那棵大柳树时，巴金抒情地写道：“好像它不是树，是我多年不见的一位老朋友。”巴金羡慕它、喜欢它、敬仰它，实际上是在抒发他对英雄的大寨人、对大寨历史的崇高感情。

巴金还对一位叫牛海贵的孩子十分关注。当时孩子才 14 岁，聪明能干，又觉悟高。巴金与这位少年促膝交谈，倾心交流，印象很深。

为此，巴金在《大寨行》成书后专门寄给小牛一本，并附上一封热情鼓励的信件。著名作家巴金给他在大寨结识的一位普通少年写信和赠书，可见他对大寨之行的怀念和珍重。

（摘自《人民网》）